

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前进

——谈谈安徽农村的改革

安徽省省长 王郁昭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时隔不足六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其间，我国农业的变化尤其出人意料。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了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的重大改革的宝贵探索。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我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正在向人们表明：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前进。

—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此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经建立，就能尽善尽美，而是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完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必然要经历许多艰难曲折，甚至可能发生大的失误，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我国建国三十五年来，的实践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另一方面，确实也经历过某些严重的挫折。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基础，规划了继续发展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原则，这些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然而它并不是每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公式。马克思在回答人们关于未来实施社会主义步骤的提问时，就曾明确指出：“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①只有把革命导师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不同国家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本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完善、发展，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艰苦的探索 and 改革创新。

社会主义要在实践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进，从根本上说，这是顺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需要。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可以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普遍的道理，就是在一切社会中，基本矛盾始终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最终来自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这种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不同。在阶级社会里，这些矛盾主要表

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第1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现为阶级的对立，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来解决，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则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虽然阶级斗争的残余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不存在阶级对立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不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方向上的不适应，而是来自这种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完善的方面，也就是体制和经营方式等环节上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用改革的方式，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党和国家领导的有步骤、有秩序的改革，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变为与之相适应的状态，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种改革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不坚持这种改革，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的前进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

近六年的农村经济改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

二

安徽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在十年动乱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比较后进。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解决了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以万里同志为首的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发

动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等政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迅速扭转了安徽的政治局势。在这个基础上，省委冲破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及时地提出了各项工作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并以农业为突破口，首先提出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了肥西和滁县地区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经验，排除干扰，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长期停滞不前的农村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的发展速度加快，效益提高了。安徽省1978年的农业总产值86亿元，1984年预计140亿元，增长62.8%；1978年粮食产量296亿斤，1984年427亿斤，增长44.2%；人均收入（包括家庭副业）1978年113元，1984年预计350元左右，增长2.1倍，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生产关系的一大调整，是对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联产承包制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是实现我国历史重大转折、推进这场改革的决定因素。广大干部群众有建国以来近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经受过“左”倾错误危害之苦，有了强烈的变革要求，是这场改革的群众基础。但归根到底，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在起作用。历史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就其经济关系的基本性质和完善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基本符合的。但因种种原因，实行了单一集中经营、集体劳动和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的形式。事实证明，这样做是不成功的。它不适应农业在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生物为主要劳动对象、以手工劳动为主的条件下，生产虽具有一定的协作要

求，但更具有分散、连续和受自然因素影响大的特点，带来了生产瞎指挥、干活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病，造成生产关系中一系列的缺陷，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也难以发挥出来。合作化以后二十多年，由于“左”的影响，不仅没有紧紧抓住这一问题取得突破，还不切实际地追求“一大二公”，搞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滋长了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管农业，经济平调现象时隐时现，农村经济统多管死，加上后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危害下，限制辅助经济、集市贸易以至集体多种经营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就象一个个紧箍咒，又从外部进一步束缚了生产队和农民的手脚，侵害了他们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使微观、宏观经济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都越来越突出。改革这种体制是历史提出的必然要求。可惜，“左”的错误和对集体经济认识上的迷误，使这种僵化的模式多年延续下来，造成农业发展步履维艰，农民生活改善很慢。

近六年来，以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场改革，不仅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农业经济在短期内蓬勃发展起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超出农业的范围，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全部经济政治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且成为当前城市改革的强大推动力。

三

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可以认为，近六年来的农村经济改革，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质生活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方式方面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基本生产单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的基石。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摸索、创新的过程。起初，群众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经过在实践中比较、融合、演化、筛选，广大农民最终选定了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办法最简单的包干到户，作为联产承包制的主体形式。这个发展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排除了“左”的思想束缚和重重阻力。一九八〇年五月，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的谈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①这篇谈话，站在一切从发展生产力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上，排除了“左”的思想阻力，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对群众在改革中将家庭经营引入集体经济，创造新的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而且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商品经济统一起来，为农村经济改革的前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联产承包制的建立，引起了农村经营方式、管理制度和经济关系上的重大变革。在经营方式上，通过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75页。

把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使家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层次和经济细胞，集体经济成为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劳动、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而又自愿互利，实行必要的统一经营、联合劳动的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并相应建立起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这就带来了生产、分配、交换诸方面经济关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在生产过程中，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更加直接结合起来，农民有了充分的劳动支配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这不仅在保持必要的统一经营优越性的条件下，有利于农民以主人翁的姿态，作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主体，能动地组织生产，因地制宜地经营承包的生产项目，而且为自主地扩大再生产，发展农业内部分工分业，为农业多余劳力及人才、资金的流动和实行多种形式的重新组合，发展广泛的社会分工，向农村城镇各个经济领域进军，创造了条件。同时，相对独立的经营，破除了劳动大呼隆和集体生产消费上的吃大锅饭，成为分别计量劳动的条件，劳动支配权成为劳动成果支配权的前提。二是在分配上，通过联产计酬和它的发展形式包干分配，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结合，生产经营者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报酬直接结合，找到了农业实现按劳分配的客观有效的形式，彻底打破了平均主义。列宁曾经把按劳分配看作社会主义发展推动力的源泉。从完善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出发，陈云同志高度评价了实行责任制的历史意义，说它不亚于三大改造。三大改造是消灭剥削，责任制则是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中曾长期存在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消除了劳动差的占有劳动好的人的劳动的现象。由于按劳分配的真正实现，调动了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农业发展有了源源不绝的内在经济动力。三是在交换上，由于在新的经营方式下，农户既是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的成员，又是有了商品支配权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在

国家计划指导下，直接进入市场，与多方进行等价交换。这就使农民扩大了眼界，在市场这所大学校园里得到锻炼，使每个家庭经济细胞都受到了价值规律的鞭策，有了来自外部的经济推动力。

生产关系上的这些变化，集中起来，主要是使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和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使集体经济的合作性与自主经营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为充分发挥劳动者的智慧、创造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集体经济和它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为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第二，农村经济改革引起了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在技术推广领域和这种无形产品的生产领域里找到了适宜的经济形式和推动农村技术进步的经济动力。

近几年，在农村有一股强大的经济动力，推动着“科学热”的普遍形成，科技普及活动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这种经济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经营结构和“两户一体”，既为农民学习运用科学技术，做到人尽其才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条件，又适宜于吸收包括传统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在内的多层次的科学技术。它的小规模、多层次，便于形成横向联系，便于发扬有机农业优良传统的特长，与世界新技术革命有许多共通之处。其次，联产承包制把技术应用于生产带来的经济效果，与广大生产经营者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成为推动群众学科学、用科学、进行智力开发的强大的经济动力。再次，农村改革推动了生产发展、分业分工和产业结构的改变，不仅为科教文的发展，提供日益雄厚的物质力量，而且对科学技术不断地提出新的需求（包括从农林牧渔虫

菌微生物到副工商建运服等多样化的技术需求，从普及到提高、从应用到开发的各种需要）以及运用和推广科学技术的新经验，从而推动科技发展。另一方面是来自科技教育本身的体制改革。这方面的改革是由农村经济改革引起的。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经济利益上关心科技，农民就用各种经济手段由近及远地把科技人员、科研单位拉向农村，使之由封闭变为开放，按照变化了的经营方式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变革。过去技术推广多是采用行政办法，搞“大锅饭”，“一刀切”，不讲责任和效益，这种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农民的要求，他们便将农业联产承包制的经验运用到技术推广领域，创造了责权利结合的技术联产承包制。这种责任制，使技术推广由行政管理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的经营管理，既保证农民得到科技带来的实惠，又使科技人员得到应有的报酬。继而，技术的有偿服务、有偿转让和技术信息市场等技术经营形式，以及人才的有偿培训和农民集资、个人投资或联合开办技术学校等形式纷纷涌现。这就在技术推广领域，在有关农村经济的科技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里，使科技这种潜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获得了合适的经济形式；借助联产计酬和无形产品的商品交换，较好地解决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交换关系，恰当地处理了科技人员与直接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了这方面的按劳分配，调动了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了科技人员和直接生产经营者发展、推广、运用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这种把农工商与科教文相结合的经济改革，为农村经济适应科学技术跃进的时代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三，顺应农村经济的搞活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初步改革了宏观农业经济体制。随着联产承包制的建立，启动了农村生产的内在潜能，粮油棉等产品大幅度增加，商品率迅速提高，冲破了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计划体制，逐步形成了以国家计划为指

导，以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价值规律为基础，仅把少量农产品征购任务作为国家指令性计划，运用合同的形式落实到户，此外农民主要根据商品价格和供求情况，因地制宜安排生产，进行销售。原来单一的由国营商业统购统销的渠道，再也不能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农民不仅寄希望于供销社的改革，而且自己进入流通，出现了从小城镇集市贸易到城市贸易中心多层次的开放的商品交换市场，形成了多渠道流通的新体制。随着计划、流通体制的改变、扩大了自由价格，与国家按照价值规律有计划地提高、调整农副产品价格结合，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各业发展和适应市场需求的灵活调整。在生产、流通领域，逐步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多种经济形式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和协作的局面，特别是农民集资入股，兴办从事农工商建运服各业的合作经济，一开始就摆脱了过去政企合一、受行政区域限制和“小而全”的框框，按照自愿互利、灵活多样、民主管理、按劳分配或按劳按股分红等原则来组织，大多数都带有专业性，形成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多样化。个体工商业服务业也在乡镇成倍增加。原来政企合一、用行政方式管理经济的公社体制，与新的经营方式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陆续实行了党政企分设，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形式不同的乡级经济联合组织。这就从宏观方面，逐步建立起有利于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

以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新的农村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生产关系上的重大改善，成为生产力活跃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强大动力，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加上实行全面发展、综合经营、城乡结合的新方针，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布局，加上技术向农业生产的加速转化等各方面的努力，使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农业发展速度加快，经

经济效益提高了。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安徽省农业总产值每年只增长1.8%，而在1979年以来的近五年每年平均增长8%以上。其次，农村经济领域扩大了，正在向专业化商品化发展，农民的购买力增强了。现在全省已有专业户19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20%，农民经济联合体有96000多个，包括家庭工业在内的乡镇企业达到26万个，比1978年增长4.8倍。全省农民生活消费中非自给性消费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42%上升到1983年的53%。第三，农村科技教育发展迅速，技术装备、生产条件改善很快。安徽已建立乡级科普组织2330个，中等农业专科学校13所，中专班12处，农业中学180所，普通中学附设农业班96处，各种农技业余学校1100所。作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中心的小城镇空前活跃、繁荣起来。第四，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出现求富、比富、帮富的局面。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安徽省农民每人每年增加收入1.25元，而近五年每年每人增加38.2元。

四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农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政治方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生动活泼、安定团结、朝气蓬勃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农村改革从一开始就完全摆脱了过去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认识和解决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错误，始终坚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来进行，从而获得了成功。这就在实践上配合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极大地帮助了全国人民认识和掌握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其次，过去经济体制上平均主义的弊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社会主

义社会矛盾的做法，最终是导致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或破坏，也就谈不上社会各方面的前进和发展。与此相反，农村经济改革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善，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经济迅速发展，从而把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处理放在了不断前进发展的物质基础上。第三，它理顺了、完善了农村的经济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使人们在经济利益上各得其所，并随着生产较快发展而持续增进。而且，它使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得到加强和发展。这种各得其所、日益增进的物质利益关系和充分的民主权利，是融化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是带有普遍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因此便从根本上成为既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经济基础，并推动这种政治局面的不断发展。随着党和国家自觉依据改革实践，制定和完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随着经济关系的调整 and 人民生活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得到改善。党与八亿农民的关系改善了，党的威望上升了，农民称赞党的政策是富民政策，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干群关系、农民相互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农民与工人、知识分子的互助合作关系发展了。所有这些都是使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发展、民主不断加强的根本原因。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政策对头了，就能够得人心。这就叫做政通人和。

在社会思想领域，农村经济改革所发生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方法，使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深入人心，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农村改革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经济体制，不是本本上的现有公式和沿袭国外的模式，不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固有框架。”它完全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自己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走出了自己

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经济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农村改革以其创造性的成果在新的历史实践中证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无比正确；它的波澜壮阔的实践，以磅礴的气势，有力地冲刷了中国大地上的“左”倾空想、主观教条主义、因循守旧的经验主义和一切违背实事求是的错误观念、清规戒律，而使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广大干部群众头脑中深深扎根，进一步造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空气，增强了人们从实际出发，勇于改革和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勇气和信心。同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农村改革也从经济体制上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早在1978年，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而且要与改革体制、健全社会经济政治民主制度相结合的新论断。他希望通过端正思想路线和经济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能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在农村经济改革之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活跃局面。从农村干部到亿万农民，每个家庭和企业，都在面对自己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和各方面的情况，动脑筋，想办法；今天，越来越多的勇于思考、探索、创新的企业家、专业户和实事求是的领导者涌现出来了。出现这种思想活跃的局面，不是单靠宣传，主要是由于经营方式和经济体制变了。这种经济体制使基层和农民享有充分的经济民主，使之能够面对每一块耕地、每一个企业动脑筋；经济责任、经济利益在督促他们钻研和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依靠实事求是吃饭、致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逐步摆脱墨守成规、满足现状的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培养易于接受新技术、新事物和富于创新、进取的新素质；各级干部摆脱了原来包揽的应由农民去干的具体事务，

有可能也必须多作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处理自己应负责解决的问题。因此，随着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根本改变了过去因体制僵化所造成的思想懒惰和思想僵化的局面，这种改变对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不可低估。

五

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条改革的路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呢？万里同志曾说，它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来的。农村改革的实践鲜明地告诉我们，群众是改革的主体，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发展依赖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在这方面，它给人们的启发主要是：（一）顺应民心，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与实事求是、按历史发展规律办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早在1978年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的洪流中，一些贫困地方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就暗暗地搞起不同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开始，我们不可能对它有深入的理性认识，主要是从农村实际情况和群众利益考虑的。农民多年被大呼隆、大锅饭和“左”的折腾搞苦了。我们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搞革命，搞社会主义，总要让农民能吃饱饭。老办法不行，农民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总不能把它当“私生子”看待，连个合法的“户口”都不给。我们再不能干违背群众意愿的蠢事了。正是站在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一致性的立场上，正确对待了农民的创造。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我们才逐步明确，这正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客观要求。这种群众利益、愿望和客观规律的一致性，展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所带来的弊病、恶果，总是最直

接地落在群众的头上，违背群众的利益，所以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普遍要求，往往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经济规律在背后起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尤其是如此。我们在改革中必须随时随地了解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坚持从群众利益出发，并且深入探索其中的规律性，使改革措施顺乎人心，合乎客观规律。(二) 要依靠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打开认识 and 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农村经营方式和其它体制上的推陈出新，以及破除束缚经济发展的旧观念，形成新认识，从根本上说都是来自群众的实践。在农村改革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对体制上的问题不仅感受直接，而且他们观察问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讲现实主义，他们从当地情况和切身利益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使自己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为标准，来判断优劣，决定取舍，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党的任务就是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支持和帮助群众当家作主，冲破旧框框，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构成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波涛澎湃，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多做调查研究，重视群众的首创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群众的新鲜经验进行具体分析，集中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总结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再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比较、选择，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使认识、办法更合乎实际，推动改革向前发展。(三) 保持健康、民主的政治生活，主要依靠实践解决人们认识上的矛盾，是保护和发扬干部群众改革积极性，保证改革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回头来看，我们的农村改革从基本生产单位建立联产承包制起步，一般是由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再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由贫困地区到中产地区再到较为富裕的地区，用了几年时间，经过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再由农业扩展到其它领域，由

基层推动上面的改革。这样一场在变革的深度、广度上如此巨大的农村改革，进行得如此健康和井然有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顺乎客观规律，坚持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掌握了积极慎重、循序渐进的指导原则。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扬人民民主，保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这种民主表现在，尊重群众创造和选择新的经营形式的自主权，不准压制改革的种种尝试；一时看不准的，先观察一段，急于下结论，打回去；区别主流和支流，只要不属违法乱纪，而是属于改革中的失误，就采取疏导的办法。这就避免了过去对“责任田”那样，还未在实践中充分展开，刚刚出土就压下去的错误，保护了干部群众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积极性和他们创造的新形式，新事物。另一方面，表现在废除了动辄给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戴反对改革的帽子，“唯我独革”、“大批判开路”，以势压人的“左”的一套。在农村改革中，没有因为对这场改革持有不同看法甚至反对而批斗人，处理人，而是在坚持群众利益、改革和四化大局的原则下，对认识较迟的同志，给以认识的时间，主要是让事实去教育人，让大家在实践这个大课堂里学习，让大家把正确的东西变为自己的自觉自愿的行动。这样就避免了“一刀切”、“一阵风”、“一哄而起”，使改革的循序渐进性和人们认识的由不平衡到平衡，由一个方面到更多方面的循序渐进性结合起来，其结果不是延长了认识和改革的进程，而是缩短了进程，搞得更加富有成效。因此，健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和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新方法，对改革的进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政治生活和新方法，归根结蒂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建筑在对广大干部群众充分信任，依靠他们的自觉自愿来推动自身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四）要不断研究新情况，不断发展群众的新经验。生产力的发展和它提出的对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方面的要求，是一个既呈阶段性又具有连续性的无限发展的历史过程。广大群众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进军中，总是为农村改革开拓着新的领域，创造着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经验。要适应生产和群众的要求，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了解新情况，总结群众的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当前，农村的改革进入了以建立新的产业结构，依托小城镇实现城乡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全面建设两个文明的新阶段。同时，农村改革的进行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向城市改革提出了要求，提供了经验，推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的早日到来。而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因此，城市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已在党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我们必须象对待农村改革那样，站在城乡改革的前头，做改革的促进派，必须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武装自己的头脑，吸取农村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加强调查研究，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顺应民心，精心指导，扎扎实实，循序渐进。农村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我们党是站在改革前列的领导者，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完善的。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农村改革中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就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夺取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的重大胜利，全面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我们改革的前途，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前途是美好的，光辉灿烂的。